

文藝陣地

第一卷至第二卷

上海書店 影印

影 印 说 明

《文艺阵地》，茅盾主编，为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重要文艺刊物，生活书店出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于香港编辑，继迁上海、重庆出版。出至1942年11月七卷四期，被迫停刊。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出版《文阵新辑》三辑。

五卷一至二期，原为24开本，又曾用《文阵丛刊》形式出版。六卷一期至七卷四期重庆版系土纸本，因字迹模糊，重排印刷，余均照原本影印。影印时加编总目，附于七卷末。

文 艺 阵 地

茅盾主编

*

上 海 书 店 印 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上 海 影 印 厂 印 刷

1983年10月 1—3000(K30—1)

第一至五卷合订二册 定价31.00元

茅公和《文艺阵地》

楼适夷

茅公，——从抗战时期以来，出于尊敬与亲切的感情，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他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六十多年如一日，始终勤奋、认真、刻苦地把他的才智、学养、时间、精力，乃至健康和生命都献给了文学的事业，对党和人民立下巨大的功勋。他在文学上的劳作，遍及各个方面，从一九二一年主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开始，便负起评论、介绍、研究、组织和培育队伍，以至创作的实践，写了大量在新文学、革命文学中处于高峰地位的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史写上光辉的篇页。

〔一〕

在这里，我专谈茅公在抗日战争时期主编的《文艺阵地》。《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全国性文艺刊物之一。当国民党政府自南京溃退，暂时立足于武汉，为其本身的生存，不得不装出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战的姿态。由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和前方战士的英勇作战，一时地使武汉形成了所谓抗战的中心。同时散处各方的文化队伍，在这一形势下，也集中到武汉来，使它似乎成为文化的中心。茅公于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携带全家从经过八一三战争炮火成为孤岛的上海，跋涉战争时期混乱艰难的道路，到了湖南的长沙，暂时把家属寄寓在长沙的郊外，只身来到了表面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武汉。当时我在党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工作，接到了他的电话，立即到汉口交通路的一家小小的旅馆里去看望他。我多么高兴，以为茅公也到武汉来工作了。他却非常平静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不打算留在武汉，已决定在九龙安家，应生活书店的约请，编辑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刊物，刊物在广州印刷，因当时生活书店的总店已移到武汉，就在武汉作为向全国总发行的地点。这次到武汉来，已与总店订约，并为刊物的事，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他知道我是打算在武汉留到最后的，而且在报社工作，同各方面联系比较广泛。就委托我在武汉为刊物作组稿和联系的工作，我当然是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嘱托。那就是《文艺阵地》的创始，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二月的初旬。他住了几天就回长沙去，按预定计划，迁居九龙，而且很快地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把刊物的第一期，独力地编辑出来了。当时香港印刷事业极为落后，而且在香港印行刊物，必须向港当局机关登记，不但需费很大的一笔押金，同时英国人的当局也决不会允许在他统治下出一个抗日的刊物。所以在九龙编好了稿子，必须送到广州去付印，而广州当时的印刷业，事实也不过比起香港算高明一点。如在第一期的《编后记》所说：“这本小小的刊物，在排校时费尽了心力，差不多每个印出来总算没有错误的字粒，都是编者奋斗的结果……”茅公就是这样地把这个抗战文艺的重要刊物，输送到全国各地，各个战区，前线和敌后的。

在创刊号的《发刊辞》上，茅公提出：“我们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一方面须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文艺阵地》是企图来适应这需要的。”这一主旨，至少在茅公亲自编辑的时期，是首先实践了的。如创刊号第一篇周行的《一个紧急的动议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提出“文艺必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后起之秀的理论工作者，后来不幸就在抗战期内逝世的李南桌，发表了《广现实主义》，指出助长当前文艺界贫乏状态的论调，以为只要“抗战就‘万事亨通’”，所以大家都朝向正号的一面，把负号的一切都秘而不宣，好象说出来就会“扰乱后方”似的。”他认为“错误的暴露（即暴露错误——引者）有时比正面的建设（即歌颂或表扬——引者）还要重要。”在这一期的作品栏里，就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塑造了一个口头叫喊着抗战，不做实际工作，只忙着开会训话，一心只想领导别人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而引起了广泛的瞩目与议论。

〔二〕

茅公独力主持，亲自动手，从遥远的南国，把《文艺阵地》一期一期的输送出来。作为这刊物的在武汉的联系人，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及主观努力的不足，帮助茅公所做的工作是微乎其微的，有时几乎是等于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的成立，一时形成抗战文艺中心的地位，而《文艺阵地》还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阵地，脚踏实地的送出好的作品与新的作家来，如《差半车麦秸》（第一卷第三期）写一个无知的受迫害的老实农民，怎样变成英勇的抗日战士，是在当时被认为优秀的新人新作。在理论上又强调提出大众化的问题，和“抗敌协会”所提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遥相呼应。

《文艺阵地》的编辑中心虽然僻处一隅，但和全国广大文艺队伍，还是息息相通的。当大多数文艺战士处于战时分散状态的时候，它和前线，后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均能取得广泛、密切的联系，及时发布战地的报告，以及在战争中出现的新作。它用《文阵广播》这样一个栏目，总汇和传达分散各地的文艺活动，和作家们的生活与战斗的消息，在整个文艺队伍之间相互沟通声气。

〔三〕

我是在所谓“保卫大武汉”的呼声中，没有去成延安，改而转道南下，到了南方海口广州的。当时广州已在大轰炸之中，但错误地估计了战局，以为武汉已朝不保夕，在广州可能还有时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文艺方面的工作。我和蒋锡金二人，准备在这儿办一个小小的文艺刊物《大地》。广州人民在大轰炸中昂然不屈，掀起热烈的抗战献金运动的景象，也使我们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我们用身边最后两毛钱买纸烟抽，在轰炸后的瓦砾中悠然散步，心中还描绘着新刊物的蓝图。其间，我一度跨海去港，到九龙拜访了茅公，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他不大同意我们这种天真的幻想，劝我到九龙去帮助编辑《文艺阵地》。那时《文艺阵地》早已不可能在轰炸中的广州印刷，而改为把编好的稿子秘密送到已成为所谓“孤岛”的上海去付印，请留在上海的孔另境同志帮助排校。印成之后，当然不可能在上海发行，而是用走私的方法，装运到香港。在香港，也是不能公开发行的，它只是作为一个转运站，通过各种渠道转运到内地去发行。茅公只手空拳，主办和实干这样的一个刊物，其艰辛的情景是难于想

象的。但那时我们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大地》的幻想，一心想苦苦地留在战火漫天的祖国内地，与茅公匆匆一面之后，又回到了广州。幻想毕竟是幻想，我们的新刊物办不起来，而广州竟然先武汉而沦陷。当我们所居住的四周市民，跟着达官贵人的首先逃命而纷纷搬迁，直到四邻空空，夜静无声的时候，才觉悟到如果再不离开，就只能当日本侵略军的俘虏了。那时我们仓惶地到西堤的江岸，去寻找撤退的交通工具。雇了一只小划子，在珠江上游荡，不管是开往哪里去的，遇到能够挤上去的轮船，便拚命地挤了上去。这是一条走西江开往广西梧州的船。连船舷都差不多会膨胀起来，挤得简直没有伸一下腿的空隙。回头怅惘地望见远远的从大鹏湾登陆的敌人，一路顺利无阻，连烧带杀，迫近广州郊区所燃起的烽烟，好容易才拜别了这个沦陷的广州。我们四个人，蒋锡金，海南岛的诗人施征军，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天马书店的经理郭少卿和我，在人缝里挤着坐了下来，才记起这正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的日子。于是大家闭目静神，以默哀来作我们纪念先生的仪式。

虽然我们中途在三水遇到了也从广州撤出到桂林去的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但到达了梧州，我们仍不知今后应该往哪里走去。在梧州落了脚，一面把沙田柚当饭吃，观光梧江上名为饷馆的开赌场与妓院的楼船，一面寻找交通工具。终于在一辆装运军火的大卡车上，当了被夹带的“黄鱼”。车上还乘着两个散兵，不时摆弄着手枪，好象在窥探我们的钱包。锡金很调皮，拉我们一并排坐在一列装炸药箱的车板上，故意同他们说笑攀谈。他估计这两个烂兵决不会对我们动手，因为他要是对我们开枪，座后的炸药便会爆炸，博得一个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地我们只费了几支烟卷，他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把手枪收进到枪套里去，一路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林木森森，环境幽静的郁林。在小旅馆里安顿下来，心宽体泰，决定了行道的方向，到九龙去找茅公。从郁林到了湛江，那时还叫做广州湾，是被法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又从那儿登上了海轮，经过风浪的颠波，终于到达了香港，原来港粤间的半天的旅程，整整地走了十三天。

〔四〕

茅公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这批狼狈的难民，听我们诉述旅途上浪漫谛克的经历，哈哈地笑了起来。因为诗人施征军一到香港，便有许多同乡来接待，蒋锡金老家在上海，决定回“孤岛”去继续活动。郭少卿和他一同回沪，准备重振天马书店。茅公把我留下，帮助他做《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刊物已出了半年，内地各处的来稿和通讯，堆满在他的案头，他日夜忙碌着，已好久无法持续自己创作的工作。我感到我有责任为他分劳，同时又不大愿意回到四周被敌人包围的上海的租界地去，就在香港留下来了。这已经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初了。那时在香港，我们所熟悉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真是寥若晨星，而且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戴望舒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叶君健主要做外事活动，许地山先生任港大文学院院长，另有围绕香港《大公报》的几个作家，我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但在这儿仍有一些便利的条件。香港的生活书店分店，通过各种渠道，与内地主要城市与各个战区，包括解放区，取得经常密切的联系，另一面又经过海道与上海联系，也沟通了华东的敌后地区。我们刊物的稿源还是很丰富的，由于茅公的勤奋，与各处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也保持得相当密切。

我得以在茅公面对面的指导下，愉快地工作，亲眼接触着茅公对待工作的态度。那时他在九龙太子道的寓楼，后窗正对着一座被劈开的小山，这半面小山赤露露地露出红色的岩壁，

香港是亚热带，十一月的午后阳光还相当骄烈，它照在崖壁反映到室内来，热度就相当的高。茅公一家把这座小山叫做火焰山，而茅公的书桌正面对着这座火焰山，他总是整天地伏案工作，阅读来稿，答复来信，以及作必要写作，浑身流着热汗，还不肯多费一点休息的时间。

〔五〕

在这样的共事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茅公告诉我，他已准备接受新疆学院的聘请，到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去担任文学院院长，如果确定下来，这《文艺阵地》就由我负责办下去。我听了大吃一惊，估量自己担不起这样的重任，但以为他的计划还在遥远，也就漫然地答应下来。不料过了几天，他的行止就决定了。他把整理得整整齐齐地一包一包来稿、来信，已阅未阅，已复未复，一一点交给我。他说：此去情况如何，还未可知，也许很快就会回来。在此期间，尽可能把刊物继续保持下去，编辑方针、体制，已经稳定，暂时毋需变动，各方面的关系也都建立起来了，大概不会有什么困难。我把任务接受下来，问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方面。他说因为编辑与作者队伍间的分散，讨论问题之类，是有一定的困难，但也不能因此放弃这个任务。同时重要的是加强与各战区前线与后方的联络，通过文艺作品迅速反映战争时期各方面的生活与斗争的现实，特别是重视新人的发掘，和大众化的倡导。我得到了这样的指示之后，便把任务接受了下来。当时他又提出，既然今后实际上由我编辑，封面上主编的名字，应该改为“茅盾·适夷主编”。这一点，则由我坚决拒绝了。我答应担任代编的任务，尽可能维持到茅公回来，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决不使它中途夭折。这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二月，在编完了预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二卷六号之后。

照那时候的交通状况，茅公是取道越南，进入昆明，再到兰州去迪化的。我和生活书店的甘遽园（伯林）同志、李南桌夫人和其他几位同志，把茅公一家，送上了去海防的一艘叫“小广东号”的法国轮船，依依惜别以后，就打开了他交给我的存稿与信件的包裹。

〔六〕

我担任这代编的任务，实际上只要勤恳一些，困难是不算大的。茅公已经把一切基础都奠定好了，我就是萧规曹随，坐享其成，很顺利地就动手工作起来。由我开始独力编辑，预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七期，正如该期《编后记》所说：“本期之稿，除一二新到以外，皆经茅盾先生校阅选定，我只是作了一道编排的手续。”这新到中的一篇，便是丁玲同志从千里迢迢的陕北，特地接受我的约请，首先作为我的第一支援者寄来一篇报告：《冀村之夜》。

当时我们在全国几个战区，都已有经常连续寄稿的许多作家，在东战场，亲身作为战斗员参加了别动队的作家骆宾基，寄来了连续登载的长篇，茅公给起了一个总题为《东战场别动队》。司马文森在第四战区的粤北战地，连续寄来了《粤北散记》。萧红在武汉最后仓皇撤出，刚刚在重庆安顿下来之后，就寄来了她的新作短篇《黄河》。从第五战区，碧野、黑丁、曾克都不断地寄来他们的战地新作，周而复给寄来了《延安的文艺》的通讯，后来又寄来新作《播种篇》。不久以前，从纳粹德国回国，在成都的s.y.（刘盛亚），连续寄来报告《在卅字旗下》。这些都成为《文艺阵地》在报告文学上所显示的特色。而同时，从武汉沦陷以后，各地交通混乱，敌军封锁加紧，《文艺阵地》也逐渐增加了运转的困难。我们通过港沪海轮上的

工友，送到上海去付印的第二卷第九期的原稿，竟一下子被敌军扣留而全部损失了，这里面包括潘梓年同志特地给我们从重庆写来的《作品中的语言问题》，刘白羽从延安寄来的《一个从札萨克来的人》和骆宾基从东战场寄来的《东战场别动队》的第八段等，使我们不得不一面急忙把准备在第十期用的稿子，提前改为第九期，一面向作者告急，希望有底稿的把底稿寄来，没有底稿的尽可能地补写和重写。

《文艺阵地》是半月刊，从作者寄稿，编辑发稿，印刷成册，再装运到发行，必须处处通过敌人的封锁及其它阻难，从后方到海外，又从海外到“孤岛”，然后再从原路回程，在每半个月之间，作两度往返，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意外的挫折，而刊物总是能够按时出版，广泛发行于大后方及各处战地，达两年之久，简直是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主要是香港和各处生活书店同志的精心筹划和忘我劳动的成果。

[七]

使我有成为孤儿似的感觉的，却是茅公一别之后，很难得到他的音讯。约摸经过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收到他于一月二十三日从兰州的来信：

……兄或以为我早在迪化，其实明日始有希望起飞。此因天气不佳，第一次迪化来机，途中去了十天，而到此后又又有苏联人要回国，弟等大队，似难同走，故请杜先生杜夫人等先走，而弟则候二次之专机……在此住了那么多日，本又可以写点东西，然而斗室中挤了四人，实在非工作之场所，加以电灯不明，入晚阅书尚不可能，遑论写作，只好到迪化后再谈矣。兄以后来信请寄兰州生活书店薛迪畅转，因兰迪间无空航，然薛君或可托使人带迪。否则，试从欧洲转，亦速于由国内转也。

这是茅公离港后的第一次来信，当时还听到传闻“他们的一行，已完成了三万余里的长征，平安到达迪化。”后来知道，其实这个传闻是不确的。以后一直到五月间，我们才得到茅公从新疆写于四月三十日的来信：

忆在兰州时曾托港友转上一函，想早收到。弟于二月二十日由兰飞至哈密，三月八日由哈密乘汽车经鄯善、吐鲁番，到了迪化，现在已逾一月又半矣。乃因诸事丛杂，不克早奉片言，至以为歉。此次万里远行，经过昆明、成都、西安、兰州。在昆明住了十多天，兰州住了四十五天。生平未尝至西北，此次乃饱览塞外风物，尤以乘汽车自哈密至迪化一段，横渡大漠，见百数骆驼之大队商，委蛇去来，可谓壮观。尤有可记者，则自港动身后，凡现代水陆空交通工具，几无不用之。自港至海防乘船；海防至昆明走滇越路，盘山而过，计穿过山洞一百五十余个；自昆明至哈密，坐飞机；哈密至此，汽车。而在兰时，又曾坐羊皮筏子渡黄河，履冰而过黄河（皆在兰垣外），盖可谓一试矣。沿途皆有所记，惜尚无时间整理之也。此间新气象，可记者甚多，亦因事冗，未能命笔，暑假时或可为之。尚拟利用假期，游历外区，北疆，如伊犁塔城，或者不乏机会先往也……

这是茅公到迪化后的最初的来信，同时也是我在香港接到的他最后的一封信，作为一个代编的人，我真正感到自己是成为一个孤儿了。

[八]

在这盼望不到茅公音讯的时候，我在香港的滞留，突然成了问题。我受已迁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老舍先生的委托，请在港大的许地山先生出面发动，成立了“抗敌文协”的香港分会，一时展开了抗战文艺的活动，造成了相当的声势。这一活动是香港当局所不愿意的，他们非常害怕日本人对他们的压力。政治部的探员们，嗅出我是在幕后策动的一人，便设法来寻找我。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中的一天，生活书店香港分店的甘伯林同志，悄悄给我送来了紧急的情报，要我迅速离开香港。我只身一人，当然什么时候要走就可以走的。

但是《文艺阵地》怎么办呢？我是答应过茅公：“不管处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一定把刊物编下去，直到您重新回来的日子！”伯林同志叫我不必顾虑，他豪爽地说：“没有关系，反正我们是在上海印的，你就在上海编吧。后方的稿子，我们会及时给你送去。”

这样地，我就回到了“孤岛”的上海，从第三卷第五期开始，《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就转移到上海了。这一期，版权页上的出版日期是六月十六日，其实编出来已经在七月里了，因此还来得及编入上海在六月十八日所举行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晚会的报导。

我们刊物在政治方面，在香港就通过与廖承志同志的联系，争取到党的领导，一到上海，首先是巴人同志，后来是梅益同志，都及时向我传达党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跟随着抗战的形势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前进。巴人同志、蒋天佐同志都在上海给我以直接具体的文艺理论方面的支持，甚至远在浙东乡间的冯雪峰同志，也在当前的文艺问题与理论建设工作，给予详细的宝贵的意见。

而在上海特别感到高兴的，在编辑第三卷第十期，即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我又接到茅公从新疆寄来的长信：

自来此后，内地音讯，忽然隔绝，邮递之慢，殊出意外，而寄出之信，能否收到，又因种种原因，据言实无把握。加以初到时旅途劳顿，心绪纷乱，且未得兄来信，亦无要事相告，合此数因，遂以迁延。四月下旬及五月上旬，始接一月十五日及三月十五日来信，当即作覆（按，此信迄今尚未收到——适）。……而兄于二月二日由欧洲转之信，则实未经由海外，仍从重庆辗转而来，而到达此间则反后于三月十五日之信一个多月也。至于兄所寄《文阵》，弟仅收到二卷七、八两期，但此两期似像由昆明转寄，非由香港直接也。

前数日始接三之七——十二共六册并五月十一日信，大喜过望。《文阵》事弟未有帮忙，累兄独力支撑，常抱不安，然亦有故，在此“打杂”之忙，甚于在港。第二，与内地文艺家隔绝，即欲作文，恨无题目。第三，此间本地风光，无可写寄。至于由港动身后的沿途印象，亦因无暇，迄未写成。总之出乎意外者太多，故寄稿之诺，遂不能践，且久久懒于握管矣……

……二卷七期至十二期各册弟略翻一过，尚未有时间卒读，然大体感得不坏，兄之努力支持已得报偿……

《文艺战线》尚未见到，因内地刊物，此间十不见一，老刊物尚可于三个月后见到，新刊物则因不为此间所知，所以根本不知道世间有此物也。

至于弟在此间生活，约略可述如下，来后成立一文化协会，弟与张仲实，现即主持此会工作。此会为半官办、半民众团体的性质，各民族文化会之负责人为此会会员，人数颇多，然日常事务则由三数人负之，弟与张仲实即为三数人中之二人。然此间民族既十分复杂，而社会情形亦颇复杂，新来者茫无头绪，此等工作，实非弟等所宜，今惟在编书方面（小学教科书）略尽其力耳。水土不服，身体日感衰弱，是个人方面的困难。两儿常念及江南风物，又以此间无适当学校可进，闲居在家，亦甚无聊。新疆学院弟担任功课每周十七小时，而大半功课与文艺无关。盖此校主要教员仅弟与仲实二人，他差不多包办了政经系功课，弟则包办了教育系功课。学生不多，约百二三十人，其中尚有五六十人为高中。内地一般青年，不知实际情形，以为新疆学院如何如何，要求进去。此辈青年，幻想太大，来亦无益也……弟饱经忧患，所见稍多，既未有幻想，自亦无所谓失望与否，个人生活从前享受已多，所谓从绚烂中过来，今在中年，已归平淡，故无所谓，唯独与世隔绝，深恐久居将成为文化上之愚蒙者耳。此间虽与苏联接近，然苏联书报，亦殊少来，无现购之书店，唯有订阅，然在三月抄订购之书报，至今未见到，此则殊出意外，深觉闷闷者也。

最后关于《文阵》，甚望兄支持下去，编辑体例，照现在样子，就已不坏，似无改革之必要，短评则常有更妙——此间青年作者，寥寥无几，所作太公式主义的了，由于读者太少之故，且亦由于所读范围不广之故。……

原来盛世才在新疆搞独立王国，伪装进步的姿态，标榜所谓亲苏、联共的政策，企图吸收一些进步文化人装点自己的门面，茅公和别的许多进步人士，乃至党的重要同志，以积极建设边疆的热情，应邀前去。他们一到，才知道盛世才是一个心毒手狠的两面派。表面装进步，内心里对革命恨之入骨，经常杀戮革命人士和进步群众。对茅公等人虽不敢明目张胆地

压迫，暗地里却戒备森严。这一种紧张的情况，茅公在信中虽未公开透露，却已有了隐约的暗示。幸而得到在新疆的地下党人毛泽民、徐梦秋同志等的负责安排，及杜重远先生的从中尽力，茅公一家与张仲实同志等，才得于一九四〇年五月离开迪化，而且中途几乎在哈密被扣，幸而盛世才的密令落在我们地下党同志的手中，才得未遭毒手，安然脱出。后来，在新疆的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和杜重远先生，都遭到盛的毒手而壮烈牺牲，杨之华、萨空了、赵丹同志等都遭受了长期的牢狱之灾。

从茅公这一封信中，想象他陷入了这样恶劣的处境，被完全与他不相称而他还是想尽量尽力的任务所困扰的情况下，仍在遥遥万里之外，心心念念地关心和怀念自己亲手哺育的《文艺阵地》。可惜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方法取得联络了。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入冬时他经过延安回到重庆的时候。

[九]

作为一个代编的人，虽由于遭遇的颠沛，与形势的变动，但主观努力之不足，我实在是非常不称职的，未能很好完成茅公的嘱咐，把刊物办得更好一些，但它在大后方，在各战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仍被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重要的文艺刊物而受到重视。按照茅公的临行的叮嘱，我尽量在无名的投稿者中间，探觅新人。在评论方面，我找到了在港的黄绳、楼栖他们，给我以很大的帮助。新的无名作家，我也忘不了在昆明中学教书的周正仪，香港生活书店的一位职员寒波，在西北的乔穗青……在上海的田青，可惜前二人我以后没有见到他们的下落，乔穗青写了一些新作品，后来也不继续下去了，田青在解放后没有音问，也不见他的作品，他们实际上是有才能的。当我离港的时候，送行的青年中有一位是袁水拍，后来他在重庆以马凡陀的名字成了名诗人。其它原来已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为《文艺阵地》尽过很大的力量，而至今仍活跃于文艺界并成为文艺界领导工作者的，当然用不到我一点将了。

[十]

在上海半地下状态中编辑的《文艺阵地》，到一九四〇年的夏季，困难是越来越严重了，但依赖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当时对外已改名为“兄弟图书公司”了）负责人许觉民、王太雷、艾寒松同志们的努力，我们在万里外的茅公杳无音讯的情况下，还是准备再接再厉地支持下去。在上海印成的刊物，不能在上海当地发行，运往内地的渠道也愈来愈窄，经过大家重新筹划，从一九四〇年七月开始，把半月刊改作月刊，并由于书店同志的坚持，把我的名字放在茅公之下，也作为主编之一。为了争取能在上海公开发行，使用两种封面，在上海的叫《文阵丛刊》每期标上一个书名，作为书籍发行，第一辑以骆宾基的一个中篇为题，叫《水火之间》，第二辑是鲁迅纪念专辑，则用《论鲁迅》为书名。运往内地的，则作为《文艺阵地》的第五卷第一期与第二期，并标明为“七月号”和“八月号”，可能就为了这一复杂的情况，由于后来的研究工作者的疏忽，特别是在重庆复刊时编者的误记，以为前期的《文艺阵地》出到了第五卷第八期，一共出了五十六期，其实第五卷只出了一、二两期，一共出了五十期。

一九四〇年冬初，茅公脱出新疆以后，在延安留居了一个时候，回到了重庆。国民党正掀起一次一次的反共高潮，重庆的形势已经很紧，从上海运去的《文艺阵地》，以不曾向国民党登记为借口，已不能公开在后方发行，但生活总店还决定争取继续出版，向国民党的重庆

市图书审查委员会正式登记，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取得审查证，就在重庆继续出版了。事先生活总店急电上海，要我去重庆继续协助茅公编辑这个刊物。我完全由于个人的原因，经过思想斗争的结果，决定继续困守“孤岛”，没有到重庆去。刊物便组织了欧阳山、曹靖华、章泯、宋之的、沙汀、艾青、以群七人构成的编委会，仍以茅公主编的名义，先由以群，后由罗荪做实际的编辑工作，这样地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第六卷第一期开始，作为月刊，出到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第七卷第四期，由于表面上在重庆虽似乎可以公开发行，而各地则实行禁止和扣发，就不能用《文艺阵地》的名义继续出下去了。后来又用《文阵新辑》的名义，每辑标出一个书名，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四四年三月之间出了《去国》、《哈罗尔德的旅行及其他》及《纵横前后方》等三辑。在重庆复刊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连载了茅公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而引起广大读者的瞩目。

人的记忆力是非常微妙的，大家读茅公最后所写的长篇《回忆录》，都感觉到茅公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他的记忆力之强，是非常惊人的。但那次我偶然和他谈到《文艺阵地》在重庆复刊的事，竟完全忘却，一口咬定并无在重庆复刊的事，还和我争论起来。我估计他那天精神不好，可能是偶然的遗忘，曾预约把复刊后的刊物送给他看。可是我没有立刻实践此事，而后来就来不及了。

茅公的回忆录亲自写到一九三四年为止，关于抗战时期以后的一段，据韦韬和小曼同志说，也已准备一定的资料，我渴望他们能根据资料补续完全，关于《文艺阵地》的一段过程，我便根据记忆和尽可能得到的书面材料，提供以上的资料作参考。今天恰巧在《人民日报》见到张仲实同志所写的回忆（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难忘的往事》），他说茅公去新疆是同他一起从重庆出发的，这应该是他的记忆的错误。

一九八一，五，一六。

（原载《新文学史料》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發刊辭

朋友們都有這樣的意見：我們現階段的文藝運動，一方面須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戰鬥的單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個比較集中的研究理論，討論問題，切磋，觀摩，——而同時也是戰鬥的刊物。文藝陣地便是企圖來適應這需要的。

這陣地上，立一面大旗，大書「擁護抗戰到底，鞏固抗戰的統一戰線！」

這陣地上，將有各種各類的「文藝兵」，在獻出他們的心血；這陣地上將有各式各樣的兵器，——只要是為了抗戰，兵器的新式或舊式是不應該成為問題的。我們且以為祖傳的舊兵器亟應加以拂拭或修改，使能發揮新的威力。

這陣地上，（我敢斷言）又將有新的力量，民族的文藝的後備軍，來增長聲威，補充火力。因為，在神聖抗戰中，在炮火洗禮下，在救亡工作的鍛鍊中，從青年知識者群中，從人民大眾群中，已經覺醒了不少的文藝天才。沒有他們來進入陣地，民族解放的文藝不能發揚壯大而燦爛。

從今天起，這陣地算是草創起來了，要是沒有許多文藝工作者的熱情和毅力，這草創也是不易實現的；但是以後，如何構築陣地，如何配備火力，如何洞明敵情而給以致命的打擊，如何搜尋後方的間諜與漢奸而加以肅清，乃至武器的淬厲，戰術的講求，……這一切，都有待於更多的文藝同志以及廣大的讀者們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扶植。

讓我們大家來鞏固這陣地罷！

我們需要展開一個抗戰文藝運動

周行

——一個緊急的動議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文藝活動還是遠遠落後於抗戰現實的發展。這自然不是一種好現象，但它卻是一件事實，我們不能也不必隱諱。據我看來，這主要是由於我們還沒有展開一個抗戰文藝運動，不，豈止沒有展開，我們其實連發動的工作也沒有有目的地做過。到目前為止，我們有的只是一些零星星星的文藝活動，我們各自為戰，沒有計劃，沒有組織，甚至沒有一個明確的工作目標；一句話，我們的抗戰文藝活動還處在一種自然發生的狀態中，還不曾轉化為一個抗戰文藝運動。

而事實上，沒有一個廣大而有力的抗戰文藝運動，要文藝服務於民族解放戰爭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敵騎日益深入，決勝的時機日益迫近，而動員更廣大的力量以從事戰爭的任務也日益成為必要的今日，我們文藝陣地上的同志們還能夠忽視這一事實麼？還可以不急起直追，整頓我們的陣容，齊一我們的步伐，而甘於放棄自己的重大的責任麼？這就是我們當前最現實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因此，首先我們要對這一個問題加以充分的注意。這裏必須指出：文藝也是一種科學，因此同時也是一種戰鬥的武器。但雖說如此，一種武器儘該它放着而不去利用它，那還是沒有用的；去利用它了，然而不知道怎樣用法，結果也還是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用。

的。這就是說：對於文藝這一種武器，我們首先必須充分認識他的性質。不僅如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考察清楚：在過去（姑且假定由「九一八」的時期算起罷），它做過了一些什麼？怎樣做？它完成了那一些任務？那一些是它必須完成的任務而它却没有完成的？同樣，它現在做着一一些什麼？怎樣做？那一些是它的優點？那一些是它的弱點？這樣做是否可以完成它可能而且必須完成的任務？只有完全清楚了這一切，我們才能夠考慮一種適當的對策，確定今後的工作方向，計劃今後的工作。

一個正確的工作綱領完全是必要的。這不僅不會阻礙我們的文藝活動的發展，而且只有加強它，使它躍過自然發生的階段而成為一個巨大的運動。這樣的一個工作綱領將怎樣產生出來，而且將是怎樣的東西呢？這必須是就上述諸問題考察的結果，同時也必須是各地文藝界同志們互相交換意見的結果，不用說，這麼一個工作綱領，今後在實踐過程中將會隨時被修正的，它決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硬化的東西；但儘管如此，我們却不能絲毫看過它的價值，因之一個工作綱領對於我們仍是非常的必要。我們必須馬上發動大家注意這問題，熱烈的參加討論，毫不保留的貢獻出自己所有的意見。

依我個人一點貧乏的意見，我以為這一綱領必須包含着如下的幾個要點：

(1) 大眾的抗戰文藝的創造。在抽象的理論上，非大眾的抗戰文藝是不能存在的。抗戰的文藝同時必然是大眾的文藝。但現實的社會現象就不一定是這麼簡單，它複雜得多，同時也曲折得多。事實上，現在儘有好一些作品對抗戰真真有幫助，但它無論如何還不能說是大眾的作品。我們不能滿足於它們相反的，我們必須指出，正由於它們不是大眾的，所以作為抗戰文藝的作用也就受了大大的限制。這一矛盾是必須努力克服的。而要實現這一必須實現的企圖，許多基本的問題如主題與方法的問題，舊形式的利用與新形式的創造的問題，技術問題，特別是大眾化問題等等，就必須一一加以究明，並在創作活動上作具體的實踐。我們需要一聯這樣的作品，它能更深入的更廣泛的反映現實，「為大眾所理解，所愛好，結合並提高大眾感情、思想和意志。」（伊里奇）我們需要提出如下的一個口號：「為大眾的抗戰文藝的創造而鬥爭！」

(2) 廣汎的通訊員運動的展開。這一工作，與創造大眾的抗戰文藝的工作有不可分的聯繫。這是文藝戰線上新的力量的貯水池，憑着它，創作活動上的大勝利才有了保證。輕視文藝通信，報告文學等，是不對的。這錯誤不在於對它的形式的評價，而在於無視它的發展的動向，無視它會從較低級的轉化而為高級的東西。還有一點：所謂更廣汎更深入的反映現實，所謂真真正正成為大眾的東西，如何才能成為事實呢？很明顯的，這必須文藝真正生根於人民大眾的生活中，然後才能成為事實。而文藝通訊員運動，它要求作家們深入到各階層的社會生活當中，它擔負着從人

民大眾中揭發新人的任務。就恰好是實現上述要求的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由於它新的文藝將以它的視野的廣濶（現實把握的廣度）勝於一切舊時代的文藝，因之它所盡的教育的作用也將是空前的巨大。這時候，文藝抗戰早已不單是觀念世界里的東西，它已成為實實在在的一件事實了。

(3) 組織統一而活動分散的體系的確立。首先必須說明：所謂活動分散，指的只是工作的方法而不是工作本身的内容。更具體一點說，這指的是活動的地域化。為什麼活動必須地域化呢？這為的是要配合着抗戰所展開的形勢，文藝工作者必須分散到全國各地，分別建立起許多新的陣地，組織起許多新的戰鬥部隊來，以執行持久抗戰的艱巨任務。而事實上從前集中在幾個文化都市的文藝人，也已自然而然地分散到全國各地去了。所以現在之提出這一點，無非是要使這種活動形態更加成為有目的的，使它更加確定，更加充實，更加發展。他一方面，正因為如此，我們同時就非常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組織。粗畧一看，這兩者似乎是不但沒有邏輯上的關聯，而且還是有點衝突的。但實際上並不如此，相反的，這只是一個組織活動問題的兩面，它們不僅不彼此衝突，而且還是相生相成的。正因為作戰隊伍是分散在全國各地，它有許多長處，但也包含着一個相當嚴重的弱點，這就是容易陷於失掉聯絡，各自為戰的混戰狀態中。為了使這一種可能的缺陷不致發生，我們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它是一個參謀本部，同時也是一個司令塔；文藝戰線上總的作戰方針與計劃，可由這里分發出去，達到各個較小的中心（交通站），再轉

到所有的支隊去，這樣，它們便可以根據當地具體的環境而分別執行；同時，各地的工作者也可以隨時把工作的情形，經驗，或任何的建議送到這里來，與其他地方的同志互相交換意見。總之，「有組織的影響，意識形態的影響，才能獲得實踐的意義。」（藏原惟人）我們非團結起一切力量，組成一條鋼鐵一般的文藝戰線不可。

(4) 批評、理論活動的強化。如上述，文藝創作活動是落後於抗戰的現實的。但文藝上的批評、理論活動，更落後於創作活動。這正是當前整個文藝活動上的一大危機。為了保證上述的幾種工作能夠順利地展開，我們必須趕快在這一方面努力補救，使批評、理論活動旺盛起來，並真真正正成為一種指導的力量。再就另一方面說，抗戰是一長期鬥爭的事業，它的勝利，不僅是民族的解放，同時也是文化的解放的勝利；凡與此有關聯的問題，不論關係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需要在理論上加以深化，也是不用說的。為了文藝科學的確立，即在戰爭期也不能一刻放鬆理論研究的工作，難道不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嗎？

以上各點，不用說即在平時也有它的必要。但我在這裏必須指出：正因為從前沒有給與澈底的解決，所以現在在抗戰期中就更加迫切的需要去解決它。同時我也必須指出：由於客觀環境的不同，在同一課題上不僅有了不少新的要求，而且也給與了許多便利於問題解決的條件。這一切，我們都必須加以注意，然後才能夠得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和一個具體的辦法，然後才能夠使我們今後的工作有一個廣大的前途。

（三月十三日于廣州）

華威先生

張天翼

轉灣抹角算起來——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我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

「天翼兄你真是！」他說。「爲什麼一定要個『先生』呢。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他立刻帶上了帽子：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天翼兄。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總是沒有時間。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餘工作方案，硬要叫我參加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這里他搖搖頭，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聲明他並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當應苦一點。不過——時間總要夠支配呀。

「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

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的結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轉着，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

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興跑，一脚一脚挺踏實地走着，好像飯後千步似的。可是包車例外：Ding hang, ding dang, ding dang! ——一下子就搶到了前面。黃包車立刻就得住往左邊躲開。小推車馬上打斜。担子

很快地就讓到路邊。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舖裏去。包車踏鈴不斷地响着。鋼絲在閃着亮。還來不及看清楚——牠就跑得老遠老遠的了。像閃電一樣地快。

而——據這裏有幾位救亡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

他的時間很要緊。他說過——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救亡工作實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錶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着，嘴唇使勁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

照例——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他在門口下車的時候總得順便把踏鈴踏牠一下：Ding

同志們彼此看看：唔，華威先生到會了。有幾位透了一口氣。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瞧着會場門口。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抓着拳頭瞪着眼。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了。他先前那付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讓大家好把他看個清楚，彷彿要喚起同志們的一種信任心，彷彿要給同志一種担保——什麼困難的大事也都可以放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並不對着誰，祇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對

整個集體打招呼。會場裏很靜。會議就要開始。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繃繃繃繃的。

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个冷角落裏，離主席位子頂遠的一角。他不大肯當主席。

「我不能當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煙打手勢。「工人救亡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俗文藝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時間不夠支配。祇容許我祇在這裏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

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輕輕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報告的時候，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裏括洋火點他的煙。把錢放在面前，時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牠。

「我提議！」他大聲說。「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我希望主席能夠在兩分鐘之內報告完。」

他括了兩分鐘洋火之後，猛的站了起來，對那正在嘩啦嘩啦的主席擺擺手：

「好了，好了。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我已經明白了。我現在還要去赴別的會，讓我先發表一點意見。」

停了一停。抽兩口雪茄，掃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見很簡單，祇有兩點，」他祇祇嚙唇。「第一點，就是——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夠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

們都能熱心工作：我很感激你們。但是還有一點——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他又抽了兩口煙，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氣。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這第二點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祇有在這一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大家團結起來，統一起來。也祇有在一個領中心的領導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夠展開。青年是努力的，是熱心的，但是因為理解不夠，工作經驗不夠，常常容易犯錯誤。要是上面沒有一個領導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臉色，他臉上的肌肉聳動了一下——表示一種微笑。他往下說：

「你們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說得很坦白，很不客氣。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沒有什麼客氣可講。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我很感激你們。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揀，瞧着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他把當主席的同志搭開，小聲兒談了幾句。

「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

「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我們……」

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頂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以後——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邊的那個長頭髮的青年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裏去過三次，華先生不在家……」

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帶着鼻音哼了一句：

「唔，我有別的事。」又對主席低聲說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她可以告訴你們。」

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他對第三者說起她來總是這麼稱呼她的。

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裏開會，正有一個人在那裏發表意見。他坐了下來，點着了雪茄，不高興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為今天另外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一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

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第一，他告訴大家——在座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應當加緊地做去。第二，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在當地的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五點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協會指導部的會議室。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一個人點頭。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

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勢，就揀在一個小鬍子

的旁邊坐下來。

他帶着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小聲兒問那個小鬍子：

「昨晚你喝醉了沒有？」

「還好，不過頭有點子暈。你呢？」

「我啊——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他嚴肅地說。「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乾掉——海，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去算賬呢：要質問他為什麼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談了這些，他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個紙條——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

「請你稍為等一等，」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現在他有點意見：要求先讓他發表。」

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起來。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彎。「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彎。「兄弟首先要請求各位原諒：我到會遲了一點，而又要提前退席……」

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聲明——這個指導部是個領導機關，這個指導部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

「群眾是複雜的。尤其是現在的群眾——分子非常複雜。我們要是不能起領導作用，那就很危險，很危險。事實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我們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也要把這担子担起來。」

他反復地說明了領導中心作用的重要，這就帶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他每天都這麼忙著。要到劉主任那裏去辦事。要到各團體去開會。而且每天——不是有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

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代替華威先生訴苦。

「唉，他真是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呀。」

可是有一次，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婦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竟沒有去找他！

他開始打聽，調查。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

「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

他看見對方在那裏躊躇，他把下巴掛了下來：

「問題是在這一點：你們的委員是不是能夠真正領導這工作。你能不能對我担保——你們會內沒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們以後工作不至於錯誤，不至於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夠担保的話，那我要請你寫個書面的東西給我。以後萬一——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負責。」

接着他又聲明：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這裏他食指點點對方的胸脯：

「如果我剛才說那些你們辦不到，那不是就成非法團體了麼？」

這應該判了兩次，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的委員。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華威先生挾着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發表了一兩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

有一天他請我吃晚飯。他說因為家鄉帶來了一塊臘肉。

我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正在那裏對兩個學生樣的人發脾氣。

「你昨天為什麼不去，為什麼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幾個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開始演講，一看——連你都沒有去聽！我真不懂你們幹了些什麼！」

「昨天——我到了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去的。」

華威先生猛跳起來了：

「什麼什麼——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怎麼我不知道，怎麼不告訴我？」

「我們那天大家決議了的。我來找過華先生，華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們秘密行動！」他睜着眼。「你老實告訴我——這個讀書會到底是什麼背景，你老實告訴我！」

對方似乎也動了火：

「什麼背景呢，都是中華民族什麼秘密行動也沒有。……華先生又不到會去，開會也不終席，來找又找不到……我們總不能把工作停頓起來……」

華威先生把雪茄一擡，狠命在桌上抽了一拳：「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顫抖着。「你們小心！你們呀，你們你們！」他倒到了沙發上，嘴巴痛苦地

抽得歪着。「媽的！這個這個——你們青年……」

五分鐘之後他抬起頭來，害怕似地四面看一看。那兩個客人已經走了。他歎一口長氣：

「唉，你看你看！天！翼兄！你看現在的青年怎麼辦，現在的青年！」

這晚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嘴裏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他打碎了一隻茶杯。密司黃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個寒噤說：

「明天十點鐘有個集會……」

炸彈片 林林

我讀報，讀着一段敵機師被我們擒獲的記載。敵機師有這樣的供辭：

我是軍人，我不能不受命令，然而我厭戰，厭此無理的侵畧戰。

午後朋友從戰地歸來，他帶來一塊染黃了泥土的炸彈片。

他說炸彈是落在田裡的。我將它收下，放在書案上，留作紀念。

那塊邊沿還有鋒利的炸彈片，看着我，好像對我說：我也是被迫來到中國的，請你不要罵我罪惡，罪惡的是日本空軍的土匪，日本的軍閥。

哦我明白了，怪道它老落在空地上，「未有損害」。

害。」

魯迅遺著 關於中國木刻的七封信

西諦先生：

惠函箋紙，版畫會目，均收到。

蝴蝶裝雖美觀但不牢，翻閱幾回，背即凹進，化為不美觀，況且價貴，我以為全部作此裝，是不值得的。無已，想了三種辦法——

(一)惟大箋一本，作蝴蝶裝，但仍裝入于一函內。

(二)惟大箋一本，作蝴蝶裝，但畧變通，仍用線訂，與別數本一律，其法如訂地圖，于疊處粘紙，又襯紙，全一樣厚而訂之，則外表全部一樣了。

(三)大箋仍別印為大冊，但另名之曰「北平巨箋譜」，別作序目。

我想，要經久而簡便，還不如仍用第三法了。倘欲整齊，則當採第二法，我以為第二法最好。請先生酌之。

箋紙當于夜間擇定，明日付郵。此復即請

道安。
迅頓首 十月十九日

二

西諦先生：

箋樣昨日收到，看了半夜，標準從寬，連「做虛白齋箋」在內，也只取得了二百六十九種，已將去取注在各包目錄之上，并箋樣一同寄回，請酌奪。大約在小紙店中，或尚可零碎得二三十種，即請先生就近酌補，得三百

種，分訂四本或六本，亦即成為一書。倘更有佳者，能足四百之數，自屬更好，但恐難矣。記得清秘閣曾印有模「梅花喜神譜」箋百種，收為附錄亦不惡，然或該板已燒掉乎。

齊白石花果箋有清秘、榮寶兩種，畫悉同，而有一張上却都有上款，寫明為「××製」，殊奇。細審之，似清秘閣版乃剽竊也，故取榮寶版。

李毓如作，樣張中只有一家版，因係色箋，刻又劣，故未取。此公在光緒年中，似為紙店服役了一世，題簽之類，常見其名，而技藝卻實不高明，記得作品卻不少。先生可否另覓數幅，存其名以報其一世之喫苦。喫苦而能入書，雖可笑，但此書有歷史性，固不妨亦有苦工也。

書名曰「北平箋譜」或「北平箋圖」如何？

綱次看樣本，大畧有三大類。仿古，一也；取古人小畫，宜于箋紙者用之，如戴醇士、黃澹齋、趙撝叔、無名氏羅漢，二也；特請人為箋作，三也。後者先則有光緒間之李毓如、伯禾、錫玲、李伯霖，宣統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則在民國四五年後之師曾、范文……時代。綱次似可用此法，而以最近之王申、癸酉箋殿之。

前信曾主張用宣紙，現在又有些搖動了，似乎遠不及夾貢之好看。不知價值如何？倘一樣，或者還不如將「永久」犧牲一點，都用夾貢罷。此上，即頌
著安
迅頓首 十月二十夜

三

西諦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紙張大小，如此解決真是好極了。信箋已于十九日寄回，并兩封信，想已到。

清秘閣一向專走官場，官派十足的，既不願，去之可也，於「箋譜」並無碍。

第二次應否續印，實是一個問題，因為如此，則容易被同一之事絆住，不能作他事。明年能將舊木刻在上海開一展覽會是極好的事，但我以為倘能將其代表（圖）作抽印以成一書，如楊氏「留真譜」之類，一面在會場發賣就更好。（雖然不知道能賣多少。）倘無續印之決心，預告中似應刪去數語（稿中紅筆作記），此稿已加入個人之見，另錄附奉，乞酌定為荷。

我所藏外國木刻，只四十張，已在十四五開會展覽一次，于正月再展覽，似可笑。但中國青年新作品，可以搜羅一二十張，但是沒有好的，即能平穩的亦尚未有。

訪箋雜記是極有趣的故事，可以印入譜中。第二次印箋譜，如有人接辦，則為紙店開一利源，亦非無益，草創蓋不易，一創成，則別人亦可踵行也。此復即請
著安

迅頓首 十月二十一日。

西諦先生：

四

五日函及北平箋譜補頁五張，已于今九日同時收到。分送印本辦法請悉如來函辦理。英國亦可送給以見並無偏心，至于德意，則且待他們法西結束之後可耳。第二次豫約數目，未知如何？倘已居五十或一百，我並不反對再印，但只須與初版畧示區別，如有餘書，則當酌加書價出售，庶幾與初版豫約及再板豫約者皆有區別也。

先前未見過十竹齋箋譜原本，故無從比較，僅就翻本看來，亦頗有趣。翻刻全部每月不過二十餘元，我豫算可以擔任。如先生覺其刻本而不走樣，我以為可以進行，無論如何，總可以復活一部舊書也。至於漸成圖版叢刊，尤為佳事，但若極細之古刻，北平現在之刻工能否勝任，却還是一個問題，到這時候，似不妨難以精良之石印或珂羅版也。

中國明人（忘其名）有水滸傳，今似惟日本尚存翻刻本，時被引用且加贊歎，而竟購不能得，不知先生有此本否，亦一叢刊中之材料也。

上海之青年美術學生中，亦有願參考中國舊式木刻者，而苦于不知，知之，則又苦于難得，所以此後如圖版刻成，似可于精印本外，別製一種廉價本，前者以擇取有錢或藏書者之錢，後者則以減輕學生之負擔并助其研究，此于上帝意旨庶幾近之。

我在這里其實並無正業，而又並無閑空，蓋因「打雜」之故，將許多光陰，都虛擲于莫名其妙之中。文學第

二期稿，創作恐不能著筆，至於無聊如「選本」那樣之雜感，前當于二十五日以前，寄奉一則也。

專此布復，即請

道安 迅頓首 二月九日。

五

西諦先生：

六月十八日函及十竹齋箋譜樣張今天都收到。箋譜刻的很好，大張的山水及近于寫意的花卉，尤佳。此書最好是趕年內出版，而在九或十月中，先出珂羅版印者一種。我想，購買者的經濟力，也應顧及，如每月出一種，六種在明年六月以內出全，則大多數人力不能及，所以最好是平均兩月出一種，使愛好者有回旋的餘地。

對於紙張，我是外行，近來上海有一種「特別宣」，較厚，但我看並不好，研亦無用，因為牠的本質粗。夾貢有時會離開，自不可用。我在上海所見的，除上述二種外，僅有單宣，夾貢（或云即夾貢，玉版宣，裏種了。杭州有一種「六吉」，較薄，上海未見。我看其實是北平箋譜那樣的真宣，已經可以了。明朝那樣的棉紙，我沒有見過新製的。

前函說的美術別集中的水滸圖，非老蓮作，乃別一明人本，而日本翻刻者，老蓮之圖，我一張也未見過。周子範也不知其人，未知是否蔡先生的親戚？倘是，則可以探聽其所在。我想，現在大可以就已有者先行出版，水滸圖及博古真子，頁數較多，將來得到時，可以單行的。

至于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為印明本插畫是不夠的，因為明人所作的圖，惟明事或不誤，一到古衣冠

也還是靠不住，武梁祠畫象中之商周時故事畫，大約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選取漢石刻中畫象之清晰者，晉唐人物畫（如顧凱之之女史箴圖之類），直至明朝之聖諭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說明；（二）再選六朝及唐之土俑，託善書者用線條描下（但此種描手，中國現時難得，則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說明。青年粗心者多，不加說明，往往連細看一，想一，也不肯，真是費力。但位高望重如李毅士教授，其作長恨歌畫意，也不過將梅蘭芳放在廣東大旅館中，而道士則穿着八卦衣，如戲文中之諸葛亮，則于青年又何責焉呢？日本人之畫中國故事，還不至于如此。

六月號之文學出後，此地尚無罵聲，但另有一種脾氣，是專做小題，與並非真正之敵尋釁。此本多年之老脾氣，現在復發了，很有些人為此不平，但亦無以慰之，而這些批評家之病亦難治。他們斥小說家寫「身邊瑣事」，而不悟自己在做「身邊批評」，較遠之大敵不看見，不提起的。但（一）此地之小品文風潮，也真真可厭，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嘵嘵，又無思想，乏味之至。語堂學聖嘆一流之文，似日見陷沒，然頗沾沾自喜，病亦難治也。

罵別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則自己不做事，罵別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與此輩理論，可以被牽連到白費唇舌，一事無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無益處。我現在得了妙法，是謠言不辯，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而順便中，則偶刺之。他們橫豎就要消滅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畧有報復之意云爾。